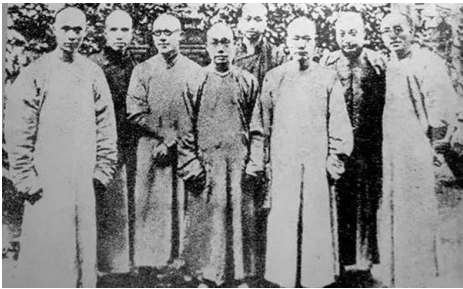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清末变局里的先觉者



1897年,时务学堂总理及教习合影。
(资料图片)

堂,它就是今天湖南大学的前身时务学堂,也是清末维新运动期间湖南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。1897年1月,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领衔正式呈请建立新式学堂,很快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。2月,回到湖南的谭嗣同在陈宝箴支持下也深度参与学堂筹建工作中。为加强时务学堂中维新派的力量,他推荐唐才常、梁启超等一批维新派人士前往任教。

时务学堂的出现,标志着湖南教育由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的转变,也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开端。

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(1898年6月11日),光绪帝下《明定国是诏》,戊戌变法正式开始。两个月后,谭嗣同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下,被光绪帝征召入京。随后与林旭、刘光第、杨锐一同被光绪帝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,成为推动变法的核心力量。

谭嗣同赴京任职时,双方政治斗争已接近白热化,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密谋废黜光绪帝,扑灭新政,政变一触即发。当年9月下旬,谭嗣同密会袁世凯,希望争取到手握兵权的袁世凯,让其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,以保证新政顺利推行。然而,这孤注一掷的计划却被袁世凯出卖给上司荣禄,又由荣禄密报慈禧太后。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都很熟悉,慈禧太后发动政变,光绪帝被囚禁,维新派成为通缉对象,变法失败。一时间全国各大城市风声鹤唳,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大量维新派核心逃亡海外,唯有谭嗣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,多方活动,筹谋营救光绪帝。直到一切努力失败后,他仍拒绝逃亡,在北京浏阳会馆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出那段荡气回肠的遗言:“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,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。”

“望门投止思张俭,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谭嗣同被捕后,在狱中题下这首诗,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,用生命进行最后一次反抗。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(1898年9月28日),高喊着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。死得其所,快哉快哉!”的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,年仅33岁。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、杨深秀、刘光第、杨锐、康广仁,六人并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

殉道的先觉者

变法期间,谭嗣同深知凶险,为不牵连家人,他模仿父亲笔迹写了一封训斥自己不忠、不孝,要脱离父子关系的信,加上此前父子间就有不同意见,这些物证将谭家受到政变的波及减到最小,谭继洵仅被连坐革职,勒令回籍,几年后在浏阳

病逝。谭嗣同的遗体于1900年6月归葬于浏阳牛石乡翟水村(今浏阳荷花街道嗣同村)。墓冢用小圆扁石砌面,青石板围护,墓碑上刻“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府君之墓”。辛亥革命后,民国政府为纪念先觉者谭嗣同,在浏阳建谭嗣同祠,祠堂横匾“民国先觉”为梁启超亲自题写,横匾至今尚存浏阳市谭嗣同纪念馆(谭嗣同祠)。

变法失败后,维新志士或就义、或逃亡,原来维新派色彩浓厚的时务学堂也于次年改名求实书院,维新派的雷飞鹏一度上了通缉名单,所幸未祸及。此后,他返还湖南故乡,闭门谢客,只在家教子侄读书,消遣时日。昙花一现的变法让雷飞鹏在苦闷中意识到,指望清廷自己改革来救国的路线完全行不通,必须寻找其他路径。积郁、彷徨之际,他结识了当时致力于新学的谭人凤(湖南新化县人),通过他了解到孙中山的革命理念。

戊戌变法那年,唐才常也准备起身前往北京参与变法,但行至汉口时,变法失败的消息传来。他随即逃亡日本,在这期间与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等人皆有接触。唐才常与谭嗣同都属于维新派中翘楚,二人都师从欧阳中鹄,深受王夫之学说影响,有强烈的民族革命色彩。某种意义上说,唐才常后来所做的,也是谭嗣同未竟之事业。

1898年冬,唐才常秘密回国,组织了自立军,全军分五路,入会者达10余万人。唐才常自任自立军总司令,设总机关于汉口。七月上旬,自立军在上海英租界愚园召开“中国国会”。

“国会”召开后,自立军五路人马分头布置,确定七月十五日为在汉口、汉阳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等地同时起事。但这时负责提供革命经费的康有为方面却出了问题,海外汇款迟迟未到,导致原定起义日期一再延期,清政府很快听到风声,在长江沿岸实行戒严。形势危急,各地自立军自行其是,仓促起义,结果迅速被张之洞率军扑灭,包括唐才常在内的自立军首领几乎全部被捕。七月二十八日清晨,唐才常、林圭、傅慈祥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残酷杀害。

辛亥大风暴

自立军起义虽以失败告终,但这次举事影响颇大,更重

要的是吸引了革命派参加,导致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迅速发展,为推动两湖地区革命思想发展和辛亥革命首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。这段时间里,雷飞鹏在谭人凤的影响下,彻底完成从维新派向革命党的转变。1902年,雷飞鹏在上海经谭人凤、章炳麟介绍加入兴中会。几乎在雷飞鹏踏上追随孙中山革命之路的同时,1903年4月,沙俄毁约拒不撤走侵占我国东北的军队,还向清政府提出7项无理要求,引起全体中国人的公愤。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秦毓鎰、叶澜、钮永建等组织500余名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集会,声讨沙俄侵华罪行,同时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,准备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。这份请战书有200余人签名参加,其中有一位29岁的湖南籍留学生将成为清末革命党领袖中,影响力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,他叫黄兴。

黄兴,字克强,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(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)人,位于今长沙市长沙县的黄兴旧宅已原址扩建为黄兴故居纪念馆。1903年的拒俄运动里,黄兴对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有深刻认知,愤慨地指出:“中国大局,破坏已达极点。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,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。”同年,黄兴回国筹备革命事业。11月4日,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,邀陈天华、张继、刘揆一、宋教仁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,商定创立华兴会,大家公举黄兴为会长,对外用“华兴公司”的名义掩人耳目。他们拟定次年秋季,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发动起义。可惜因起事计划泄露,清廷对革命党展开围捕,黄兴被迫流亡日本。

对黄兴而言,这次流亡最大的收获,是在日本结识孙中山。他对孙中山革命理念深表认同,大力支持孙中山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。1911年4月27日,由黄兴策划并亲自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,此役惨烈异常,黄兴带领“先锋”120余人,臂缠白巾,手执枪械炸弹,吹响海螺,冒着枪林弹雨与清军鏖战。清军巡防营以优势兵力对革命党进行残酷围剿镇压。作战中,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,他强忍剧痛,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,战况极惨烈。遗憾的是,这次起义还是因寡不敌众失败,大量革命党精英牺牲。

黄兴负伤突围后到香港养伤,随着中部同盟会的成立,黄兴开始考虑中部革命的可能性。此时雷飞鹏已成功进入敌人内部,成为一名清朝官员,奉命前往东北任职,但他的另一层身份是中国同盟会辽东支队的领导人,将革命火种从湖南带到辽东。辛亥年(1911)前后,两湖地区革命思潮如火如荼,湖南籍的革命英杰更是英雄辈出:

湖南浏阳人焦达峰、湖南澧州(今澧县)人蒋翊武、湖南醴陵人程潜、湖南邵阳人蔡锷等都已在为迎接革命浪潮紧锣密鼓地准备。这次决定时代命运的地点是邻省湖北的武昌。

1911年10月10日,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清王朝的丧钟,起义军攻占武昌城内的楚望台军械所,缴获步枪数万支,炮数十门,子弹数十万发,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汉口鏖战之际,黄兴率军赶到支援,起义军连连告捷,在掌控武汉三镇后成立湖北军政府,鼓舞了全国革命士气。

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,它引起连锁反应,让中国震动。湖南在焦达峰策划下首先响应,于1911年10月22日发动起义,兵分两路攻入长沙城内,占领了谘议局、军装局(军火库)和巡抚衙门,起义迅速获得胜利。10月30日,在云南任职的湖南籍将领蔡锷、唐继尧等人也在昆明举行武装起义,因这天是农历九月初九日,也称“重九起义”。在整个辛亥革命中,全国各地爆发的武装起义,几乎都能看到湖南籍志士的身影。

辛亥浪潮风起云涌之际,雷飞鹏所在的东北地区革命却一度遭到镇压,连他自己也成为被通缉的对象而被迫逃亡。虽遭此迫害,但雷飞鹏为顺利推动东北地区的革命,于1912年1月冒杀身危险回到东三省从事革命活动。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,涌现出无数湖南籍志士,谱写出无数英雄壮歌。跟无数殉道者相比,雷飞鹏是幸运的,他见证了变法浪潮、亲历了革命风云,也曾亲冒杀身风险参与其中。辛亥革命成功后,他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,晚年回到湖南从事文化事业,得以善终。而他一生的经历,也正是清末民初那段激荡岁月里,无数湖南籍革命志士的缩影。

湖南革命爆发时,有一位来自湘潭韶山的青年投入革命军,成为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,当得知清朝灭亡后,这位青年决定离开军队,继续学业。然而曙光并未来临,北洋军阀以“民国”之名行专制之实。孙中山、黄兴再次举起革命大旗,失败后再度被迫流亡;辛亥元老蔡济民发出“无量头颅无量血,可怜换来假共和”的悲叹。民国初年的三湘大地未得半刻安宁,长沙城头悬挂的十八星旗早被血雨浸透。再后来,督军张敬尧在湘江两岸架起机枪大炮,对湖南人民展开暴虐统治,湘潭米市的算盘声里混着军饷账本的贪婪与血腥。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?有人呐喊,有人彷徨。1918年,那位韶山青年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,踏上前往北京之途。不久后,他将与同志们一起迎接觉醒年代。

周渝(摘自《国家人文历史》)

